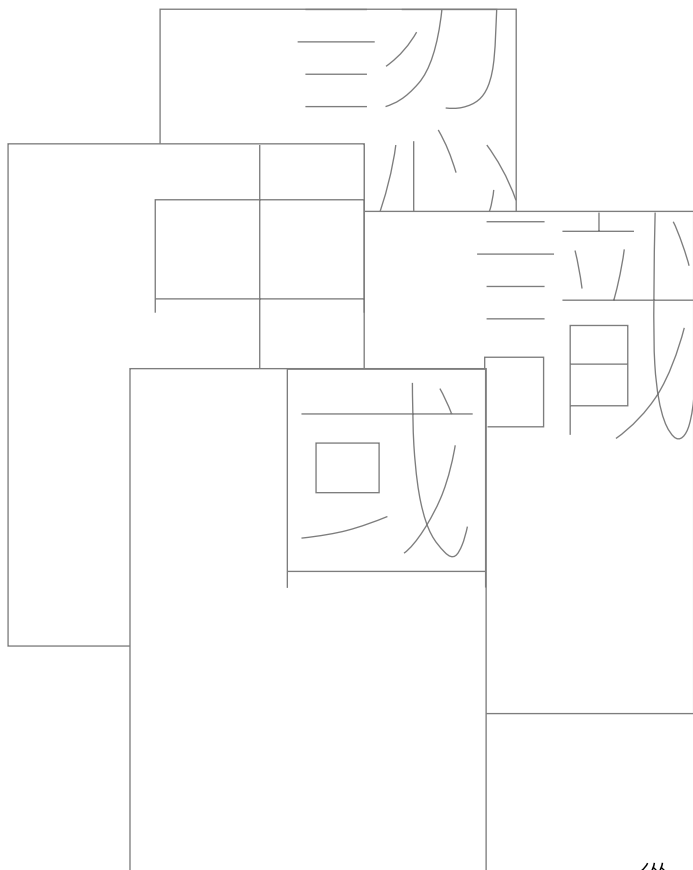




從 絲綢之路
到 《共產黨宣言》

Understanding China

The Silk Road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著 …… 彼得·諾蘭 Peter Nolan

譯 …… 溫威

目錄

導言	vii
----------	-----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

引言	03
1. 陸上絲綢之路：西域	06
2. 海上絲綢之路：南海	22
3. 西方殖民主義與絲綢之路	38
4. 中國、絲綢之路與世界	45
結論	50

中國、西方殖民主義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引言	57
1. 非殖民化	59
2.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61
3. 英國	65
4. 法國	69
5. 美國	71
6. 「珍珠鏈」	78
7.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79
8. 俄羅斯	82
9. 西方殖民主義對太平洋的影響	83
結論	88

《共產黨宣言》在 21 世紀

引言	95
1. 共產主義元素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成長	97
2. 產業集中與寡頭競爭	102
3. 資本主義的動態與技術進步	105
4. 資本主義的全球特徵	108
5. Class Struggle	111
6. 金融與實體經濟	119
7. 環境	122
8. 共產主義與公社	124
9. 共產主義與中國	131
結論	133

「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 在英國演變的啟示

引言	143
1. 1750—1867 年	146
2. 1867—1914 年	166
3. 1914—1945 年	180
4. 1945—1979 年	196
5. 1979 — 2015 年	219
結論	242

導 言

中國正在進入新的複雜的發展階段。中國已經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一個不起眼的角色，成為國際舞台上強大的一員。中國在全球經濟和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將會繼續擴大。如今中國儘管規模龐大，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將面臨不計其數的政策挑戰。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兩個關鍵議題，是其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意識形態遺產。中國共產黨正在就這兩個問題開展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西方如果希望更好地認識中國，就需要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內思考這些問題的深度和正在開展的辯論的廣度。

本書所收錄的四篇論作，都是關於中國領導人面臨的這些核心問題的某個側面的研究。第一篇探究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在工業革命前兩千年間的長期關係。直到 18 世紀時，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引發英國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是由商人沿著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傳播到了歐洲。第二篇探究工業革命使西方獲得無與倫比的全球經濟和軍事力量後，19—20 世紀西方工業化國家

在亞太地區的滲透。西方通過暴力征服，在全世界廣闊的管轄地形成了主權遺產，其中甚至包括亞太地區——中國自己的「後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將這些權利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為西方國家這些遙遠領地周圍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提供了法律保護。第三篇探討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意識形態議題，即在分析中國未來階段面臨的政策挑戰時，以甚麼方式解釋和運用卡爾·馬克思的智慧遺產。「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意味著甚麼？這個問題現在對中國具有重大的意識形態和實際的意義。第四篇探究「class struggle」^[1]的議題。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普遍的「階級鬥爭」，本質是政治團體之間的派系爭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深刻影響，中國已出現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中國領導人對於英國「class struggle」發生的方式非常感興趣，試圖了解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何以沒有發生「階級戰爭」，而是「從議會道路邁向社會主義」。^[2]

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時，中國正陷於極度貧困，在全球經濟中無足輕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總體方針。當時中國以外很少有人相信此舉能成功。1989年底，社會主義制

[1] 本文class struggle的內涵並不完全等同於「階級鬥爭」一詞，因而在翻譯中多數保留了英文原文。後文中，作者和譯者有進一步說明。——編者注

[2] 論述英國「從議會道路邁向社會主義」議題的文章和書籍為數眾多，不勝枚舉。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反覆論及這個議題之外，一些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拉爾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也從不同角度闡述了這個議題，本書第四章分析了他們的觀點。

度在整個東歐崩潰。1990 年 2 月，蘇聯共產黨在蘇聯 70 年的統治正式結束；1991 年 12 月，蘇聯不復存在，解體成多個主權國家。中國在 1989 年及東歐、蘇聯在 1989 年至 1991 年發生一系列事件後，西方普遍認為共產黨政權在中國存在不了多久。此外西方的一致觀點是：從東德到越南，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歷史顯示，不可能由共產黨領導「過渡」到市場經濟。按照這種反覆被提及的觀點，「政權更換」是運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國際機構的政策建議，還是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媒體，幾乎整個西方都眾口一詞地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不會繼續，即便萬一存續下來，也建立不起成功的市場經濟。^[3]

從 1989 年、1990 年到現在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看來情形與西方普遍預想和希望的大不相同。蘇聯解體之後，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並未步其後塵。很多人仍抱有希望並為之努力的中國「政權更換」並未發生。中國共產黨現有 8700 萬黨員，將在 2021 年迎來建黨一百周年。共產黨領導中國實現了現代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增長和發展。在政治社會穩定的保護傘下，中國保持了 30 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政府統籌佈局了龐大持久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包括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大壩、發電送電設施、電信、供水排水系統和住房；按比例規模遠遠超過可比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中國的改革將市場競爭逐步擴大到經濟的大多數領域。通過謹慎的實驗改革路徑，「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改變制度，使人民慢慢適應從國有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採取這種漸進實驗的過程，也使政策

[3] 對這些議題的詳細分析，請參見 Nolan, 1995。

制定者能依次逐個解決問題，同時又保持對制度改革總體路徑的把握。這些改革釋放出了本土企業的生產力，吸引了大多數國際領先企業的投資，使中國能迅速吸收先進技術，獲得了巨大的「後發優勢」。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如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全球第一。^[4]中國是世界上國際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的製造業產值居全球之首，比美國多三分之一，超過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總和。自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的貧困率大幅下降，幾乎所有社會群體的實際生活水準都有顯著改善。

儘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在試圖從中低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時，仍然面臨巨大的政策挑戰。有大量文獻論述這些挑戰，其中包括人口老齡化、農村剩餘勞動力枯竭、腐敗、環境嚴重污染、自主創新水平低、本土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地位低下、居民收入和財富差異懸殊、國際環境敵對等等。2013 年 11 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指明了這些挑戰的全局性質，概述了下一階段制度改革的路線圖（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決定》重申，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強調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應該「大幅度減少」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應該繼續研究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4] 使用購買力平價還是有許多實際問題，不僅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質量有差異，還因為要獲得商品和服務的「全球價格」困難重重。儘管統計學家付出了極大努力，但人們普遍認為購買力平價往往會高估發展中國家的 GDP。

《決定》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決定》強調中國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強調需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堅持黨的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決定》形容中國正進入「新階段」，改革處於「深水區」。在這個階段，中國「面臨艱難的抉擇」，需要「涉險灘」。為了克服多重挑戰，黨需要「衝破陳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需要「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逐漸恢復到工業革命前的位置，給中國的國際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議題。從漢代（公元前 202—公元 220）直到 18 世紀後期的兩千年間，中國都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的地方。那個時期大部分時間內，中國都與中亞及東部、南部沿海各國有深厚的商業和文化關係。「朝貢制度」是這些關係的外交象徵，本書第一篇就探討了這些關係的歷史證據。通過與周圍地區深入的商業往來，中國的技術不僅傳播到這些地區，還傳播到歐洲。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起源於中國。而在工業革命之後，西方與亞太地區的關係發生了劇變。英國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場」。這場經濟革命為陸軍和海軍革命奠定了基礎，使西方國家能建立起遼闊的殖民帝國。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確定為中國下一階段國際關係的核心戰略。中國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豐富經驗，為中亞和東南亞絲綢之路的

發展做出重大貢獻。這不僅為建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周邊國家的和諧關係帶來了巨大希望，實際上還給歐洲復興提供了前景，因為中國可以利用豐富的金融和人力資本儲備，參與並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廣大地區的發展。

本書第二篇分析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形成過程中西方殖民歷史遺留的影響。按照該公約規定，每個國家都可以在其領土 200 海里範圍內建立起專屬經濟區，區內及海下資源歸該國獨有。中國無爭議的專屬經濟區約有 90 萬平方公里，而且圍繞南海專屬經濟區與好幾個國家有爭端。即便在這些糾紛中全都獲勝，中國擁有的專屬經濟區仍然不到 300 萬平方公里。這跟西方國家（俄羅斯、美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太平洋及其周圍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合法控制的專屬經濟區相比，還不足十分之一。西方國家之所以擁有這些專屬經濟區，就是因為它們過去在中國「後院」的殖民統治。2014 年 12 月，丹麥對北極 90 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提出領土主張，稱之為丹麥專屬經濟區的一部分。丹麥的專屬經濟區包括丹麥周圍 14.9 萬平方公里、法羅群島周圍 26.2 萬平方公里，以及遠離丹麥大陸的龐大「自治」海外領地——格陵蘭島周圍至少 440 萬平方公里。丹麥宣稱擁有北極領土所憑藉的主要事實，是從加拿大延伸到西伯利亞海域、與格陵蘭島連接的長達 1800 公里的羅蒙諾索夫海嶺。〔*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2014 年 12 月 16 日〕西方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合法擁有廣闊的海外領地，為保衛這些領地，西方國家不惜發動戰爭。^[5] 這些因素給中國

[5] 福克蘭戰爭的起因是英國為保衛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南喬治亞島和南桑威奇群島的遙遠管轄地，這些領地周圍的專屬經濟區共有 180 萬平方公里。

在南海爭取主權帶來了不同的著眼點，若把中國與該區域兩千年的關係結合起來考慮則尤其如此。

中國共產黨自 1949 年起就領導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繼續領導這個國家。2013 年 11 月中共黨中央的《決定》意在「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並且「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作為「衝破陳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努力的一部分，共產黨人一直在深入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的原著，從而思考這些著作原文對於中國渡過「深水區」有何現實意義。在這項工作中，沒有甚麼著作比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所寫的《共產黨宣言》更重要了。本書第三篇專門結合 21 世紀初期的情況，重新研究這些文字。恩格斯期待在英國發生暴力階級戰爭，但是並未發生。而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資本主義產生的階級將反過來控制誕生它的制度。少數「先鋒」黨通過政變的思想暴力奪取政權，表明工人階級還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成熟。工人階級通過甚麼過程在政治上奪取控制權，涉及多大程度的衝突，都無法預測。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也是馬克思最熟悉的國家；他認為就英國的情況而言，走和平演進的路徑使工人階級成為主導的政治力量是可行的。馬克思 1883 年去世時，英國已經在沿著這條道路前進，例如工會運動發展，選舉權擴大，以及產生了改善工人階級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各種議會法案。這個過程的確是和平的，但是「革命」或「共產主義」的性質卻不少一分一毫。

要盡力確保穩定和諧的發展，中國的領導層強烈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謂的「階級鬥爭」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隨著市場力量越來越

深地滲透到經濟之中，收入、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已加劇到令人警惕的地步。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過，階級不平等有可能變為暴力的「階級戰爭」。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很大一部分內容集中在如何使社會更公平、更公正，實現「共同富裕」和「無論收入高低都均等享受公共服務」。

《決定》有大量篇幅涉及政府、法律、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這些改革的醞釀針對的是從基層到省級和中央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的「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法律制度的基礎是憲法，憲法「具有最高權威」，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法」。《決定》承諾「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這個目標雄心勃勃，要確保「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定》中還包括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例如「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以及實施學生「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試行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制度。收入分配將主要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進行再分配調節，目標是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並且「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政府計劃「統籌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藥品供應、監管體制綜合改革」，並且「健全全民醫保體系」。

英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誕生地，在這裡「能在所有各種關係之中全面地研究無產階級」(Engels, 1845:50)。馬克思和恩格斯成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英國生活並且都逝世於此。在馬、恩對於歷史變革推

動力的認識中，「class struggle」處於中心，而將這個短語翻譯成中文實屬不易。中文的標準譯法是「階級鬥爭」，這個字眼是用來形容「文革」期間發生在中國的暴力破壞的政治爭鬥。正如本書第四篇闡明的，實際上英國「class struggle」的歷史很少接近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預言的英國會發生暴力「階級戰爭」，也沒有發生「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和 1794 年（即『大恐怖』）不過是一場兒戲」那樣的革命（Engels, 1845:64）。事實上，英國歷經的是一條通過工會組織解決「class struggle」，「從議會道路邁向社會主義」的長期緩慢的演進路徑。中國正在認真研究英國的這段經歷。

參考文獻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Beijing.

Engels, F., 2009 [184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London: Penguin edition.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1]

-
- [1] 本文的簡短版本發表於2014年3月的中國發展論壇，後為烏茲別克的會議「中世紀東方科學家和思想家的歷史傳承以及對現代文明的作用和意義」準備了一個稍長的版本（Samarkand，2014年5月15－16日）。Tim Clissold、Stephen Perry和張瑾對本文提出了意見，謹致以感謝。

1987 年，在中國陝西的法門寺，地宮中出土了 20 件美輪美奐的琉璃器，這是唐代傳入中國的東羅馬和伊斯蘭的琉璃器。我在欣賞這些域外文物時，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滿足於欣賞它們產生的精美物件，更應該去領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滿足於領略它們對以往人們生活的藝術表現，更應該讓其中蘊藏的精神鮮活起來。

（2014 年 3 月 28 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

引 言

2011—2012 年，美國宣佈對全球戰略方向進行重大調整，將重點轉向亞太地區：「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與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至印度洋地區和南亞的弧形地帶的發展息息相關，這既帶來了挑戰，又帶來了機遇，機遇和挑戰都不斷演化。因此，儘管美國軍隊將繼續為全球安全做出貢獻，我們勢必要重新平衡，轉向亞太地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美國國防部），2012:2〕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公開表示：「21 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就像以前的各個世紀一樣。」（Clinton, 2012）她進一步闡述了美國戰略方向的轉變：「政治的未來將在亞洲決定，而不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決定。美國將處在行動的正中心……因此，美國未來 10 年治國方略中最重要任務之一是確保大幅增加在亞太地區的投入——外交、經濟、戰略及其他投入。」（Clinton, 2011）

未來幾十年美國國際關係戰略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是打造一個亞洲政治和軍事的同盟網，美國認為再次介入亞洲對該地區的未來極為重要：「該地區渴望我們的領導和參與——也許比近代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渴望。我們是唯一一個在該地區擁有強大同盟網絡卻沒有領土野心，有著為共同利益提供長久支持紀錄的強國……我們現在的挑戰是

在整個太平洋打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持久的關係網，正如我們在大西洋所打造的一樣。」(Clinton, 2011)

直到二百年前，歐洲對中亞、東南亞以及中國本身的了解還極為有限，主要是從通過海陸絲綢之路與東亞交易的中間商那裡獲得二手信息。庫克船長在 1768—1779 年進行了著名的探索航行，此時歐洲人幾乎不了解亞太地區。英國的北美殖民地於 1776 年宣佈脫離英國獨立時，美國由一小群聚居在遼闊北美大陸東部邊緣的殖民地居民組成。^[2]遠眺太平洋的西海岸加州直到 1850 年才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連接中西方的「一帶一路」政策作為中國國際關係的關鍵部分。2013 年 9 月 7 日，習主席在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013 年 10 月 3 日，他在印尼國會的演講中提出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兩千多年來與亞洲鄰近地區有著密切關係，通過新疆與中亞、通過南海與東南亞保持著深厚長期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新疆和南海分別構成中國進入中亞和東南亞的「門戶」。

2013 年，習主席訪問了中亞，包括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和哈薩克。這次訪問意義特別重大，因為還沒有美國總統訪問過蘇聯解體後原屬蘇聯的中亞國家。習主席還訪問了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和印尼，並於 2014 年春出訪歐洲。他在這些出訪的一系列演講中清晰地闡述了在新的「一帶一路」上建設中歐橋樑的構想，特別強調港口、機場、公路、鐵路、水電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的發展，這些設施對於刺

[2] 1780 年，美國只由位於北美大陸極東邊緣的 13 個州組成，當時人口有 280 萬，其中 220 萬是白人，大部分來自英國，60 萬是黑人，大部分是奴隸。

激商業關係極為重要，而商業關係是增進相互了解和溝通的基礎。

習主席每次出訪都強調理解歷史對相互了解的重要性：「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只有了解一個國家從哪裡來，才能弄懂這個國家今天怎麼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也才能搞清楚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裡去和不會往哪裡去。」(Xi Jinping, 2014b) 他強調商業關係對文化交流與和平發展的貢獻，一再指出增進彼此文化了解對和平發展的重要性：「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甚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Xi Jinping, 2014a)

中國和歐洲處於新絲綢之路的兩端。習主席的演講指出，中歐之間自古以來沿著水陸交通建立了長期聯繫：「我們需要建設共同文化繁榮的橋樑，將中國和歐洲這兩大文明連接起來。中國是東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歐洲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Xi Jinping, 2014a) 他在訪問中強調了中國思想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對歐洲發展做出的貢獻：「中國的四大發明，也就是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引起了世界的變化，包括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國的哲學、文獻、醫藥、絲綢、瓷器和茶葉抵達西方，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馬可·波羅遊記》廣泛激起了人們對中國的興趣。」(Xi Jinping, 2014a)

習主席強調了中亞和東南亞作為連接中歐兩地橋樑的重要性：「橋樑不僅讓生活變得更加方便，還可以是溝通、了解和友誼的象徵。我到歐洲，是為了和歐洲的朋友一起，搭建一座橫跨歐亞大陸的友誼和合作之橋。」(Xi Jinping, 2014b)

1. 陸上絲綢之路：西域

公元前一百多年，中國就開始開闢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漢代張騫於公元前 138 年和 119 年兩次出使西域，向西域傳播了中華文化，也引進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中國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對外交流的活躍期。據史料記載，唐代中國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七十多個，那時候的首都長安裡來自各國的使臣、商人、留學生雲集成群。這個大交流促進了中華文化遠播世界，也促進了各國文化和物產傳入中國。

（2014 年 3 月 28 日，習近平在聯合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

經濟地理

「西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心臟地帶，從中國甘肅省的玉門關起，延綿約一千英里至烏茲別克西部的奧克蘇斯河（當地語稱「阿姆河」）。玉石（軟玉）的源頭位於新疆中心和田四周的山坡和河床中。天山—崑崙山脈將西域一分為二，新疆和中亞地區各民族通過貿易相互融合，兩千多年來緊密相連。兩千多年來人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大夏雙峰駝，大型駝隊通常有兩三千匹駱駝。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將新疆稱為「中國通往亞洲心臟的前門」(Lattimore, 1950:ix)，其中心是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從四周山脈中流下的水灌溉了盆地周邊的一系列綠洲。中國對中亞的全面了解始於漢武帝的使節張騫，張騫出使西域 13 年(公元前 138—前 126)，從新疆進入中亞，報告西域的情況。萬里長城始建於公元前 221—前 206 年，部分是為了保護從新疆進入中亞的貿易路線。漢武帝在公元前 141—前 87 年當政，他下令修建的玉門關成為中國進入西域的入口。玉門關位於長城終點和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北接戈壁沙灘，南臨西藏群峰，狹促地擠在兩者之間。

儘管新疆「兩千多年來都處於中國的政治版圖之內」，但中國對新疆的控制一直是斷斷續續的(Lattimore, 1950:5)。在漢朝(公元前 202—公元 220)、唐朝(618—907)、元朝(1271—1368)和清朝(1644—1911)的一些年間，中國直接控制新疆，新疆和中亞之間有一種「中國治下的和平」關係。中國只有一次真正努力在新疆以西建立控制。公元 751 年，伊斯蘭國家阿拔斯哈里發帝國的軍隊在現屬吉爾吉斯的怛羅斯之戰中打敗中國軍隊，此後中國再沒有試圖將疆域擴大到天山山脈以外的中亞地區。

幾千年來，貿易將西域與中東、俄羅斯和印度連在一起：「亞洲腹地的史前記錄現在可以一路追溯到石器時代的遷徙以及歐洲與中國之間整個地區的貿易……在黑海和黃河之間，遠古的商旅和文化傳播之路橫貫了亞洲腹地。」(Lattimore, 1950:6)古時的貿易路線在相繼發生的政治和宗教動亂中成功地保存下來，新疆和中亞的聯通地區成為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之間的「閘門」：「貿易、遷徙和征服的活動由此

萌發。」(Lattimore, 1950:7)

「河中地」(古代粟特)是中亞的核心，位於阿姆河(奧克蘇斯河)和錫爾河(古稱「藥殺水」)之間，包括撒馬爾罕和布哈拉這兩個絲綢之路的中心城市。如果更廣義地定義中亞的「寬泛文化區」，則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新疆。該地區在歷史初期就開發了複雜的灌溉系統和城市居住系統。公元前1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將中亞描述成「千城之地」，包括由富庶農業地區環繞的宏大的城市貿易和製造中心，這些農業地區有縛喝(今阿富汗的巴爾赫)、木鹿(今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和康居(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Starr, 2013:29)城市的貿易關係延伸到了印度、中東和中國：「中亞城市(在古代晚期)的獨特成就是將大規模灌溉系統所需的成熟組織能力與出口引導的農業和製造業結合起來，並培養了大量走遍世界的貿易商以及管理他們交易的生意人。」(Starr, 2013:35)「河中地」周邊的王國繁榮昌盛，包括西部的花刺子模國、南部的大夏國和東部的大宛國。該地區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侵略，間或才由某位統治者暫時統一。不過，整個地區受到共同力量的有力影響，這些影響主要通過貿易來傳播，最重要的是佛教和伊斯蘭教，但也包括拜火教和蘇菲教。

佛教時代

貿易 公元前73—前49年，中國通過一系列軍事行動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完全控制，佔領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的主要城市。通過征服新疆，中國成為「塔里木無可爭議的主人」，連接中國與西方的行

商路線得以經常使用。(Talbot-Rice, 1950:175) 中國農業技術和灌溉方法的引入，幫助了沙漠兩邊一系列「綠洲王國」的發展，包括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阿克蘇、喀什、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和于闐(今新疆和田)。到公元 1 世紀，這些城市已是重要的貿易中心，絲綢之路通往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北部和南部，也穿過準噶爾通往天山北部。

絲綢之路在漢朝得到發展，^[3] 此時歐洲在羅馬人的統治下實現了統一。中國從中亞進口各種物品，包括戰馬、香料、香水、葡萄酒、寶石(例如天青石)、金銀器和玻璃器皿。儘管長期以來中國對中亞的主要出口產品是絲織品，中亞也有自己古老的紡織業，很多製品都出口。它學習中國的技術，發展自己的絲織業，而且借鑒和改進了中國的造紙術，用棉纖維代替絲，發展自己的造紙業。(Starr, 2013:46-7) 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絲線和絲織品，到周朝末年(公元前 221)，玻璃製造的藝術從西域傳入中國。(Sullivan, 1964:187)

在羅馬帝國的最後幾百年中，橫跨中亞的貿易有很多都經過貴霜王國。1-3 世紀，貴霜王國在鼎盛時期統一了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眾多地區，縱橫交錯的道路將貴霜王國與印度、中國和中東連接起來：「貴霜帝國通過這些方式接觸到世界最偉大的文化中心。商隊所經之處，特別是絲綢商隊所經之處，產生了智力和文化的交流。」(Talbot-

[3] 公元前 106 年，第一批橫貫絲路的商隊從中國穿過大夏，將絲綢直接從中國帶到波斯。(Talbot-Rice, 1965:140) 絲綢之路的西部終點位於中東的偉大貿易城市，包括佩拉特的著名考古遺跡。帕爾米拉是這些城市中最偉大的，為商隊提供金融服務並在邊遠地區設立驛站，驛站中有為商人及其動物提供的旅館，為商品提供的儲物庫，還有辦公室和一間神殿。(Liu Xinru, 2010:31)

Rice, 1965:142) 考古隊在阿富汗迦畢試^[4]的貴霜避暑行宮中發掘出的珍貴寶藏包含各式各樣的異域器皿，有來自地中海的青銅雕像、印度的象牙雕刻和中國的漆器。這些寶藏幾乎肯定包括來自中國的絲製品，不過已經腐壞了。(Liu Xinru, 2010:48)

漢朝在統治末年失去了對新疆的控制，貴霜帝國也瓦解了，不過大量中國絲綢繼續穿越中亞，「大部分歸功於由宗教機構、商戶組織和地方社區維護的自動貿易網絡」(Liu Xinru, 2010:62)。在整個佛教時代，絲綢仍是絲綢之路上交易最頻繁的商品(Liu Xinru, 2010:72)。雖然龐大的帝國分崩離析，中亞絲綢之路沿途的綠洲城市卻存活下來並繁榮昌盛，這部分絲綢之路地區發展成為「相對穩定和可維持的商業幹道」(Liu Xinru, 2010:64)。羅馬帝國瓦解後，絲綢繼續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堡)佔據著重要位置，儘管它發展出自己的編織業，但絲線還是經由中亞從中國進口(Liu Xinru, 2010:74)。

由於商人起到的關鍵作用，中亞城市成為「整個歐亞大陸的主要國際中轉站」，構成「為中國、印度和中東之間貿易服務的主要銀行業和金融中心」(Starr, 2013:44)。中亞城市不僅是龐大貿易網絡的總部，還是生產製造的中心，很多製品都出口，包括像刀刃、螺絲、曲軸和泵管這樣的優質鋼製品，以及玻璃器皿、藥品和各種異域產品(Schafer, 1985)，甚至還有樂器。這些只是出口到中國和絲綢之路上其他地區的無數產品中的一部分。

[4] 迦畢試位於阿富汗，毗鄰現在的巴格拉姆，巴格拉姆在美國佔領阿富汗期間是大型美軍基地。2014年一位接受《金融時報》採訪的人士對美軍從巴格拉姆撤軍評論道：「在外國人來以前，甚麼都沒有。」(Financial Times, 2014年9月10日)

中國當時是世界最重要的絲線^[5]和絲織品生產國，中亞自己生產絲織品的技術也越來越成熟。到 5—6 世紀，中國和中亞之間就專業絲製品及其技術流程發展出複雜的雙向交流。（Liu Xinru, 2010:80）到 18 世紀末，桑蠶吐絲的技術從中亞一路傳入中東，包括拜占庭和北非，粟特的貿易城市（今烏茲別克的城市）發展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基地。

絲綢服裝變得越來越漂亮。粟特人發明了「緯絲」藝術，由維吾爾族人加以改進，11 世紀的中國人使其變得完美：「到中世紀末，緯絲織片已傳入歐洲，在但澤、維也納、雷根斯堡和其他地方被織入大教堂的法衣中，盧卡的紡織工匠仿製中國的龍鳳，並根據中世紀晚期的裝飾規則加以改造。」（Sullivan, 1964:184）著名的「撒答刺欺」織錦是在布哈拉附近的撒答村製造的。數百年來，五顏六色、繡著生動動物主題的織錦被製作出來，沿著整條絲綢之路販售。（Liu Xinru, 2010:82—3）撒答刺欺織錦在絲綢之路的一端裝點著中世紀的歐洲教堂，在另一端裝點著敦煌的佛教洞窟。（Liu Xinru, 2010:83）

7 世紀，唐朝重新建立了對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綠洲城鎮的控制。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達到新高，「整個近東和中東的集鎮上都能找到來自中國的貨物」：「川流不息的駝隊載著中國貨物穿過中亞的幹道」（Sickman 和 Soper, 1956:143）。在相反方向，「載著異域商品的駝隊成群抵達長城關口」（Liu Xinru, 2010:87）。7—8 世紀，中國的都城長安（現在的西安）是世界最偉大的城市：「街上滿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與如此龐大帝國的都城正相適宜。有些是來自印度的傳教士，有

[5] 世界約 80% 的生絲現由中國生產。

些是來自波斯和中亞王國的官員和商人，還有哈薩克族和烏茲別克族人、阿拉伯人和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貿易商……佛教和道教殿堂、伊斯蘭教清真寺、摩尼教和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古稱景教）的教堂並肩聳立。」（Sickman 和 Soper, 1956:143）

文化 由於漢朝軍事力量進入新疆並且貿易關係深化，漢朝文化深受中亞影響。漢武帝征服新疆，使中國的旅行商人出行中亞相對容易，旅行商人帶回許多故事：「中亞有遼闊的沙漠和壯麗的山脈；崑崙是世界的軸心；匈奴人在沙漠中打仗狩獵；印度是奇怪新宗教的家園……」（Sullivan, 1964:217）漢朝的藝術「充滿西域（即中亞）主題……受到西域影響的證據在漢朝藝術中隨處可見」（Sullivan, 1964:217）。從烏茲別克進口的汗血寶馬成為漢朝的皇家標誌，深深融入漢朝的象徵物件中。（Liu Xinru, 2010:18）

相繼出現的不同民族和文化通過征服、貿易和傳教活動影響了中亞。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 334—前 323 年征服了大夏和粟特，希臘人在中亞修建了無數由城牆包圍的城市，許多希臘定居者在亞歷山大的中亞帝國瓦解後留了下來。古希臘文化對中亞有著深刻影響，但又與來自印度東部的佛教文化交織在一起。佛教藉助中亞對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始於漢朝：「很難想像，中亞過去近千年來對佛教的篤信程度與現在對伊斯蘭教的篤信程度並無二致。但自公元前 1 或 2 世紀直至阿拉伯人的征服，事實確實如此。」（Starr, 2013:81）^[6]

歷史上的佛祖生活在約公元前 500 年，是摩揭陀國（今尼泊爾）的

[6] 斯塔爾（Starr）的研究中包含一張 1903 年的珍貴照片，內容是從巴基斯坦的沙里拔羅發掘出的一尊完好無缺的佛像。（Starr, 2013:84）

王子。佛教從貴霜王國統治下的印度北部傳入中亞，王國的錢幣一面刻著統治者的圖像，另一面刻著佛祖的圖像。貴霜帝國的藝術帶著濃烈的古希臘風格，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絲綢交易的影響，這種風格逐漸與印度佛教風格融合，產生了佛教雕塑和繪畫風格的原型，並從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傳入中亞，再從中亞傳入中國。大量的佛教建築、藝術和雕像都是於穆斯林時代之前在中亞產生的。信佛的商人為絲綢之路上的寺院佈施，寺院本身也常常成為大型的商業企業。在 8 世紀伊斯蘭教征服中亞前，「佛教機構在歐亞東部絲綢之路的沿途各處提供了基礎設施」(Liu Xinru, 2010:72)。寺院與之後的歐洲教堂一樣製造了精美的宗教物品，通常鑲嵌著珠寶和寶石。這些物品包括壁畫、雕塑、廟宇、絲綢畫和在懸崖峭壁上雕刻的巨大佛像。從(阿富汗)的巴米揚立佛到(山西)的雲岡石窟，巨大的佛像散佈在整條中亞絲綢之路上。(Liu Xinru, 2010:64)

公元前約 120 年，商人和傳教士沿著從中亞到中國的商隊路線將佛教傳入中國。漢朝滅亡(220)後 500 年間，佛教在中國深深扎根：「連接中國與西域的沙漠之路……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各種思想和藝術形式湧入中國的幹道。」(Sickman 和 Soper, 1956:86) 4—8 世紀的整個時期可以被看作是「佛教時代」，不僅在中國，在整個亞洲都是這樣：「(佛教)席捲了除西伯利亞和中東以外的整個亞洲大陸，為這個遼闊的地區帶來了文化統一，統一程度之高後無來者。」(Reischauer 和 Fairbank, 1958:147—8)

佛教在擴張的頭幾百年裡，「得到了傳教士和朝聖者源源不斷的滋養，這些人在印度和中國之間往返流動」(Sullivan, 1964:221)。約 200

名中國僧侶歷經艱險長途跋涉到印度，在佛教的發源地取經，這些僧侶的姓名都記載在冊，最著名的是法顯 (Fa Hsien) 和玄奘。法顯於 399 年動身前往印度，穿過中亞，於 414 年乘船回到中國。〔Fa Hsien, 1886 (英譯本)〕唐朝的力量在 7 世紀和 8 世紀早期達到頂峰，在「中國治下的和平」時期，傳教士和朝聖者可以在中亞各地自由往返 (Sullivan, 1964:224-5)。玄奘在 629-645 年前往印度北部後回到中國，他回來後寫下了著名的遊歷見聞錄《大唐西域記》〔Beales, 1906 (英譯本)〕，並傾注畢生之力將佛經譯成中文。中亞的學者和僧侶對佛經的中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7]

中國的佛教寺院累積了大量經濟資源，並將自身功能擴展為「被迫害者的避難所、旅客的驛站、醫院、公共浴場，甚至是原始的銀行機構」(Reischauer 和 Fairbank, 1958:175)。中國出產的大批佛教雕塑和繪畫多姿多彩，融匯了古希臘、印度、中亞和中國的藝術傳統，置於敦煌、雲岡、龍門和龜茲等瑰麗的石窟中。敦煌位於甘肅西部，是一座綠洲城市，由於地處「中國和西域國家之間的大幹道」，發展成為貿易和佛學的繁榮中心。(Sickman 和 Soper, 1956:135) 敦煌石窟包含大量從 5 世紀末到 8 世紀的佛教繪畫。山西的雲岡石窟藏有 5 世紀製作的精美佛經卷冊：「混雜多種語言的佛教傳到中國時，所有語言——古希臘語、犍陀羅語、印度語、伊朗語和中亞語——開始融匯成一種表達中國信仰和熱情的一致宣言。」(Sickman 和 Soper, 1956:90) 洛陽是魏朝 (386-556) 的都城，據說 6 世紀時有三千名外國僧侶在這裡居住。洛陽的龍門石窟匯聚了一大

[7] 蘇聯學者李特文斯基推測：在將佛經譯成中文的已知譯者中，6 位是印度人，6-7 位是中國人，但 16 位是中亞人。(Starr, 2013:86)

批崖壁佛雕和數千座較小的雕像。龜茲位於新疆西部，克孜爾石窟包含 14 座佛教洞窟，這些洞窟有 800 多個岩洞和製作於 2—7 世紀的大量佛教繪畫和雕像。玄奘在 7 世紀參謁龜茲石窟，在此停留兩個月。258—312 年，至少有 6 名龜茲僧侶參與了包括《妙法蓮華經》在內的佛經中譯。（Ghose, 2008:12）到 3 世紀，龜茲僧侶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印度、中亞和中國佛教的「文化經紀人」（Ghose, 2008:13），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鳩摩羅什（344—413），據說他將約 300 本佛經譯成了中文（Ghose, 2008:15）。

唐朝包容四海的特質不只反映在宏偉的佛雕和寺院中，其藝術和工藝還顯示出中亞在各方面產生的驚人影響：大量外國人在中國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從中亞進口的異域貨物源源流入中國，都對唐朝產生了影響。（Schafer, 1986）「從波斯和薩珊進口的物品，例如雙耳細頸瓶、角狀杯和貝殼杯，進口時是金屬製品，結果陶器也按這樣的形狀來製作；西域銀器的凸紋面裝飾被複製到陶製執壺兩邊的鑲花浮雕上；白瓷器被用來仿製阿拉伯的玻璃杯。洛陽和長安街道上熙熙攘攘的外國人做著自己的買賣，踐行著自己的宗教儀式，對於這番景致，墓穴的陶塑上常有著生動的描繪或揶揄。」（Sullivan, 1964:215）

在 7 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中亞後，佛教遭到打壓。很多佛教徒退避到新疆，進一步加強了佛教在該地區起到的重要作用。841—845 年的暴力襲擊嚴重遏制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8] 隨後，佛教再沒有恢復到像歐洲基督教那樣的全國性有組織宗教的地位。不過佛教仍是中國文化

[8] 據官方記載，4600 家寺院和 4 萬個神祠在這些年間被摧毀。（Reischauer 和 Fairbank, 1958:175）

生活的重要部分，包括與禪宗相關的超凡脫俗的禪畫（禪宗結合了中國道教傳統和來自印度及中亞的佛教傳統）。^[9]13 世紀是禪畫的鼎盛時期，包括大量山水畫、人物畫，還有最重要的靜物畫，例如牧溪的《六柿圖》，將「激情內斂在驚人的靜謐中」（Arthur Waley, 轉引自 Sickman 和 Soper, 1956:263）。^[10]1368 年，元朝滅亡後，元朝王族返回蒙古，此後蒙古人開始全面皈依佛教。到 16 世紀，蒙古人信奉的主要佛教形式是藏傳佛教。佛教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不再是正式的宗教，而是被道教吸收，但在內蒙古和西藏地區，佛教仍然是以寺院和祭司為基礎的正式宗教。

穆斯林時代

7—8 世紀，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和「河中地」後，伊斯蘭教取代佛教成為整個中亞的信仰系統。儘管伊斯蘭教也多次經歷興衰，但始終處於中亞文化的核心，今天該地區幾乎沒留下千年來信奉佛教的痕跡。1526 年，巴布爾在帕尼帕特戰役中取勝，隨後建立了莫臥兒帝國，

[9] 斯塔爾指出蘇菲教和拜火教與主張冥想的佛教之間可能有聯繫：「尋求消除自我、從凡塵俗世中解脫和擁抱永生的中亞蘇菲教，其精神和靈魂的修煉與引發塔吉克斯坦修建佛祖『大般涅槃』（最高境界涅槃）巨像的佛教傳統最終相差多遠？」（Starr, 2013: 98）另外還可以說佛教的冥想派與道教之間有聯繫。西方基督教的神秘主義傳統與東方的神秘主義傳統也很相似。

[10] 牧溪的大部分繪畫保存在日本藏畫中。像《六柿圖》這種畫的意境與歐洲 17—18 世紀精雕細琢的「靜物畫」截然不同，西方繪畫與之最接近的可能是也試圖接近佛教「大同」思想的 20 世紀「抽象」藝術。不過藝術史學家蘇利文強調中國禪畫家與現代抽象藝術家不同：「即使是最極端的中國表現主義派也總是尋求純粹形式背後的意義……牧溪和瑩玉澗對玄奧狂放意境的表達不是反映在空洞的筆畫中，而是反映在和尚撕經或霧中浮現山村這些形態中。對畫家和書法家來說，空有形式從來都是不夠的。」（Sullivan, 1964:199）

穆斯林的影響由此從中亞深入到印度。8—9 世紀，中亞在波斯征服者、建都於布哈拉的薩曼王朝的統治下繁榮起來：「繁榮以農業、手工藝品和貿易為基礎，他們的王國成為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來客豔羨的對象。」(Soucek, 2000:73)突厥的喀喇汗王朝在千年之交取代了波斯的薩珊王朝，統治中亞直到 12 世紀。

在倭馬亞王朝(661—750)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哈里發的統治下，穆斯林商人主宰了整個中亞的貿易路線：「穆斯林貿易商很快接管了絲綢之路上的大多數貿易，而伊斯蘭教就像之前的佛教一樣，在所有的主要貿易路線上建立了自己的機構……為絲綢之路的一大片區域(提供)基礎設施。」(Liu Xinru, 2010:106)伊斯蘭商業庇護人遵循之前阿拉伯統治者的做法，在整條絲綢之路沿途興建驛站，為商人及其動物和商品提供住宿和安全保障。例如，11—14 世紀，安納托利亞半島的賽爾庫克(1037—1144)和鄂圖曼(1453—1922)的統治者在該地區興建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驛站，為貿易，特別是與中亞的貿易提供便利。(Stierlin, 1998)

蒙古人在 13 世紀征服了亞洲大部分地區，他們大肆破壞，摧毀了包括伊斯蘭和佛教藝術品在內的不少物品。不過在蒙古人的統治下，13—14 世紀，從中國到中東的遼闊疆域組成了一個統一帝國。暴力征服結束後，由於處在蒙古帝國中心，又是各文明交會的地帶，蒙古治下的中亞享受了相對的和平和繁榮。1257 年，忽必烈可汗在大都(今北京)建都時，從布哈拉帶來紡織工匠為蒙古皇室製作織錦，特別是撒答刺欺織錦：「忽必烈可汗選擇用服飾來體現其王國的帝國榮耀，令其全體隨從，包括宮廷衛戍在內穿著繡金織錦。」(Liu Xinru, 2010:123)

正是由於「中國治下的和平」所實現的統一，馬可·波羅才得以遊歷中亞。馬可·波羅沿途經過眾多興旺發達的商業城市，包括巴格達和巴士拉（在今伊拉克境內）、大不里士、亞茲德和克爾曼（在今伊朗境內）。馬可·波羅詳細記載了絲綢之路沿途興旺發達的新疆綠洲城市，包括葉爾羌（今莎車）、媲摩（今于田）、車爾臣（今且末）、喀什和于闐（今和田）。關於喀什，他寫道：「（它）曾是王國，但現在受大可汗統治。（這裡）村鎮眾多，居民以貿易和勞作為生，果園和葡萄園豐美，房屋鱗次櫛比。（人們）大量種植棉花、亞麻和大麻。土地肥沃多產，生活資料豐富。很多準備在世界兜售器具的商人將該國作為起點。」（Marco Polo, 1974:80）關於于闐，他寫道：「（它）受大汗統治……市鎮眾多……生活資料儲備充足。（人們）大量種植棉花，有眾多葡萄園、房屋和果園，人民以貿易和勞作為生。」（Marco Polo, 1974:82）

1370 年，穆斯林突厥人帖木兒在中亞奪取政權，成立王朝，該王朝在 1370—1507 年統治中亞。儘管帖木兒的戰場遼闊，從新疆打到敘利亞，但帖木兒帝國的核心是「河中地」。這個時期是中亞史上「最輝煌的一章」（Soucek, 2000:123）：長途貿易再度興盛，包括與明帝國的貿易。橫跨中亞的龐大貿易路線在位於絲綢之路西部終點的安納托利亞半島催生了一個大繁榮時代。13—14 世紀，中國向中東和歐洲「無限量」供應生絲（Inalcik, 1994:218），^[11] 在塞爾庫克帝國和早期鄂圖曼帝國的統治下，主要由穆斯林商人開展的貿易在整個中亞持續繁榮：「伊斯蘭突厥人將統治範圍從中亞擴大到巴格達、埃及和南歐後，從中

[11] 有證據顯示在蒙古征服後，中國對鄂圖曼帝國的生絲供給被以大不里士為基地的伊朗供給取代（Inalcik, 1994:219），但相關證據不完整。

東到中亞的絲綢和羊毛掛毯及小氈毯的發展達到高潮。」(Liu Xinru, 2010:107)

這為中世紀歐洲絲織品業的興旺發達奠定了基礎。鄂圖曼帝國的 center 布爾薩成為「東西之間的世界市場，不僅是生絲的，也是其他亞洲貨物的市場，因為世界貿易路線的網絡在 14 世紀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Inalcik, 1994:219)。除了來自中國的絲綢，被生產出來交由商隊沿途交易的貨物還包括來自印度和中亞的絲綢、羊毛、棉織品、地毯、掛毯和帷幔，來自東南亞的香料、象牙和布料，以及來自西伯利亞的皮革。(Stierlin, 1998:60) 此外，中國開始在這個時期沿著絲綢之路出口茶葉。(Liu Xinru, 2010:109)

9—15 世紀，中亞在科學和藝術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該地區產生了才智超群的偉岸人物，在數學、天文、地理、醫藥和哲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步，這些人包括花拉子米(783—847)、法干尼(798—865)、花拉揚迪(al-Khwarajandi, 11 世紀)、比魯尼(973—1048)、伊本·西那(亦稱阿維森納, 980—1037)和庫奇(al-Quschi, 1402—1474)。中亞最著名的天文學家是兀魯伯·貝格(1394—1449)，他是「河中地」的實際統治者，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取得了無數成果，有名的事跡包括在撒馬爾罕的雷吉斯坦廣場興建了一所引人矚目的伊斯蘭學校，還在撒馬爾罕的近郊修築了一座天文台。他分類記錄了 1108 顆恆星。在元朝統治下，中國的蒙古族統治者大量任用來自中亞的科學家。忽必烈可汗將中亞的醫生請入皇宮，並下令將伊本·西拿的《醫典》譯成中文，印度醫學界也使用這本《醫典》，該書還被譯成拉丁文，在歐洲大學作為基礎醫學課本使用，直到 18 世紀。元、明兩朝大量任用來自中亞的天文學家，於

是出現了「天文學絲綢之路」：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在中國的天文學中起了重要作用。明太祖於 1368 年在傳統的司天監之外另設回回司天監，由來自布哈拉的札馬魯丁擔任監令。（Starr, 2013:452—3）中亞的天文研究被譯成中文，穆斯林天文學家製造了一座觀星盤，於 1385 年被安裝在南京的觀星台上，用來觀測恆星。

傳統的運輸方式主要使用駱駝載貨，沿絲綢之路運輸貨物成本昂貴，於是海上貿易的發展逐漸超過了陸路。絲線和織品的價值重量比很高，但隨著中國瓷器、茶葉以及後來棉織品在幾百年來的出口增加，與西域交易時與其走陸路穿越中亞，還不如走成熟的航線由東南亞穿越南海更有優勢。16 世紀以後，海上絲綢之路沿岸的貿易迅速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中亞陸路的沿途貿易就絕對減少了。

16 世紀，中亞的帖木兒王朝被昔班王朝取代。16—17 世紀，該地區「似乎經歷了一段繁榮和增長的時期」（Soucek, 2000:150）。18 世紀和 19 世紀初，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分別由不同的可汗統治。海路貿易增加的同時，受到與中國、莫臥兒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之間交流的刺激，陸路貿易也保持了活力，一直到 18 世紀。（Levi, 1999）^[12]

明末清初，中國龐大的經濟經歷了持續的商業發展和繁榮，刺激了通過新疆與中亞的貿易的持續開展，18 世紀的新疆再次處於中國的直接統治下。17—18 世紀，印度北部和中亞之間的貿易發展壯大。莫臥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需要大量中亞的馬匹，中亞則從莫臥兒王朝的印度進口棉花、棉織品和染料。（Levi, 1999:528—530）印度的莫臥兒統治

[12] 利維(Levi)的研究為了解中亞經濟史上研究不足的時期帶來了新的曙光。

者「修建了數百座橋，開設了數百家驛站，保護了最重要的貿易路線」，由此刺激了與中亞貿易的增長。（Levi, 1999:529）17 世紀晚期，布哈拉可汗經常與莫臥兒統治者交換外交信件，要求對方採取措施確保商人在貿易路線上的安全。（Levi, 1999:530）

16 世紀後，俄羅斯帝國向東部擴張，刺激了俄國人對在南亞生產、通過中亞交易的貨物的需求。浩罕汗國（Khanate of Kokand, 1709–1876）統治下的費爾干納谷地（Fergana Valley）在此期間經歷了快速經濟發展：「在整個 18 和 19 世紀，越來越多的大批俄國貨物被從奧倫堡帶到浩罕汗國^[13]，數千浩罕商人再將這些貨物運到天山那邊的喀什、葉爾羌和其他新疆城市，很大一部分貨物又從這裡被運到更遠的中國和印度市場。浩罕商人帶著茶磚、絲織品、瓷器、銀器和大黃（醫用或染色）等中國貨物回到費爾干納山谷。節節上升的俄國需求刺激了塔什干和費爾干納山谷的發展，為了出口到不斷增長的俄國市場，浩罕汗國投資灌溉系統來刺激棉花生產的發展。」（Levi, 1999:541）

[13] 浩罕汗國的根基在塔什干和費爾干納山谷。

2. 海上絲綢之路：南海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漢代，兩國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開了往來的大門。15世紀初，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每次都到訪印尼群島，足跡遍及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佳話，許多都傳誦至今。幾百年來，遙遠浩瀚的大海沒有成為兩國人民交往的阻礙，反而成為連接兩國人民的友好紐帶。滿載著兩國商品和旅客的船隊往來其間，互通有無，傳遞情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對來自爪哇的奇珍異寶有著形象描述，而印尼國家博物館則陳列了大量中國古代瓷器。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的演講）

經濟地理

中國的內部貿易和商業化在歷史早期就得到了高度發展，總值始終遠遠超過國際貿易的總值。國際貿易在一些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受到中國政府的嚴格限制，最明顯的是在明朝初期。在1757—1842年的清

朝，歐洲商人只能通過廣州與中國進行交易。不過除了這些限制，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期，中國在南海沿岸以及通過南海進行的國際貿易持續開展，相對暢通無阻。儘管南海貿易的總值與國內貿易相比相形見绌，但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歷史上佔據重要位置。南海地區包括今天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和台灣，以及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等國，從歷史角度看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單一地區：「（南海）因其本質近似地中海而不同尋常。它從東北角到西南角的主要貿易航線處於兩次季風的路線上，因此特別適合季風時節出航。」（Wang Gungwu, 1998:3）也許我們能將亞洲東西之間的貿易叫作「亞洲東西部的商品交易和思想交流」，南中國海是其主要貿易路線：「它是第二條絲綢之路。它的水域、島嶼和海峽就像是中亞的沙漠和山口；它的港口就像是驛站。它對中國南方人的意義就像玉門關以外的土地對中國北方人的意義一樣。」（Wang Gungwu, 1998:3—4）

古代和中古時代

從中國穿過南海抵達東南亞和南亞的貿易路線有著悠久的歷史。羅馬帝國時期，中國與西域之間的海上貿易通過巴巴里肯和巴利加薩這些印度港口與中亞的路線連接起來，商人既包括阿拉伯人，也包括羅馬人。羅馬人甚至在印度東南海岸的波杜卡（Poduca）修築了一個貨棧，他們建造了倉庫、商品加工作坊和船塢。（Liu Xinrui, 2010:40）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的貿易到漢朝時（公元前 206—公元 220）已經高度發達，在唐朝時（618—907）大幅擴張，在宋朝時（920—1271）繼續

增長到更高水平。

中國船隻自歷史早期以來就在整個南海和南海以外開展長途貿易航行，早在公元前 1 世紀，中國商人就可能到達了埃塞俄比亞和東非。(Needham, 1970:42) 中國船隻約在 350 年航行到馬來西亞的檳榔嶼，約在 400 年之前航行到錫蘭(今斯里蘭卡)，到 4 世紀可能抵達了伊拉克的幼發拉底河口，停靠在亞丁灣。(Needham, 1970:41) 東非海岸有大量中國錢幣，最早的可追溯到約 620 年；東非還有成堆的中國瓷器碎片。1955 年，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寫道：「從達累斯薩拉姆到基爾瓦群島的這兩個星期，我見到的中國瓷器碎片數量之多，竟是以前從未見過的，簡直可以用鏟子來計量。我想可以公正地說：就自 10 世紀起的中世紀而言，坦噶尼喀埋藏的歷史被寫在了中國瓷器上。」(Mortimer Wheeler, 轉引自 Needham, 1970:51)

中國在公海的悠久貿易史，尤其是穿越危險南海海域的貿易歷史，刺激了海洋科技的進步。中國領航員率先在海上使用磁羅盤：「這一水手技藝的偉大變革引領了定向導航的偉大時代，到 1090 年被中國船隻確證有效，約 100 年後首次在西方出現。」(Needham, 1970:44) 不過可以肯定，磁羅盤在被用於海上之前在中國早已被用於觀測風水，而且中國船隻最初使用磁羅盤的日期可能早到 850 年。(Needham, 1970:48 和 247) 船艏柱舵輪對橫渡公海的長途航行極其重要，在歐洲它的最初應用是在 12 世紀晚期，不過它在西方出現之前早就在中國被使用了，也許早到 5 世紀。(Needham, 1970:253-4) 可能是被阿拉伯商船採用，它被傳到西方。(Needham, 1970:258) 磁羅盤和艏柱的使用對葡萄牙的海上探索極為重要。(Needham, 1970:261) 早在 2 世紀，中

國的船隻就首先運用了水密艙的原理，但西方船隻直到 18 世紀末才採用（Needham, 1970:66），按此原理製造的艙壁結構或可以使船艙在船身進水時不被淹沒。中國船隻至少從 3 世紀起就採用了多桅桿，而歐洲船隻直到在 15 世紀才採用了「有 3 個以上桅桿的全帆」多桅系統。（Needham, 1970:67）

早在唐朝，中國南方的港口城市就聚集著大量外國商人和水手。一位 750 年到訪廣州的來客發現港灣有無數南亞、孟高棉（崑崙）和「波斯」（即中東）的遠洋船隻，有些是大型船。它們裝載的藥品、香料和貴重物品「堆得像山一樣高」。來自錫蘭、伊斯蘭世界和東南亞的不同種族的商人和水手在這裡短期停留或長期居住。（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47）722 年以後，據說每年約有 40 艘大型外國船隻抵達廣州。879 年廣州被黃巢叛軍洗劫時，阿拉伯人的記錄顯示 12 萬外國人遭到屠殺，包括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和摩尼教徒。（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47-8）儘管這個數字似乎被嚴重誇大了，不過也說明即使在這麼早的時期，在華外國商人的數量已較為龐大。

從羅馬時期直至 14 世紀，阿拉伯商人主宰了從東南亞橫跨印度洋的貿易。（Needham, 1970:42）正如我們已看到的，他們對橫跨南海的貿易也很重要。印度人、波斯人和來自東南亞本身的商人在橫跨南海的貿易中也起到了作用。不過，中國商人在貿易中起著中心作用。早在 13 世紀，由中國人建造、中國船員操縱、載著中國貿易商的船隻就組成了南海貿易的重要部分。（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46）16 世紀第一批歐洲人與中國開展貿易時，正逢「大部分由中國人進行的」橫跨南海交易蓬勃發展：「源自元朝或可能早得多的本土中國人的商業擴張，

為歐洲從海上入侵中國鋪平了道路。」(Fairbank 和 Teng, 1941:202) 例如，馬尼拉在西班牙的統治下繁榮發展，主要因為它是中國和美洲之間的中轉站。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完全是由中國船隻和商人開展的。(Fairbank 和 Teng, 1941:202) 大量證據表明，19 世紀早期中國與馬來西亞就有活躍的「平底帆船貿易」。

中國出口南海的主要傳統產品是絲綢，但瓷器和茶葉在唐宋兩代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從南海以外的地區進口各種產品，不僅包括來自東南亞的，還包括來自波斯、敘利亞、阿拉伯、東非和印度北部的產品。中國南方城市揚州、廣州、寧波和溫州是南海交易中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很多專家認為泉州（福建）是海上絲綢古路的終點^[14]，可以說直到元朝，南海交易最重要的港口是泉州。確實，有些學者認為 10—14 世紀的泉州理應被貼上「世界大型商場」的標籤。（Schottenhammer, 2001）

最近對塞丁普拉（Satingpra）和馬來半島的考古研究，為了解 1000—1400 年橫跨南海的貿易的性質帶來了新的曙光。（Stargardt, 2001）^[15] 塞丁普拉是一個源自 5 世紀左右的知名王國，從 8 世紀或 9 世紀開始處於蘇門答臘東南的室利佛逝 / 三佛齊王國的影響之下，甚至可能被其征服。塞丁普拉在整個南海的貿易以及前往印度洋的中轉貿易中佔據著特別有利的地理位置，它處於克拉地峽的東部、馬來半島的狹長頸部。克拉地峽在此處只有約 70 公里寬，一條大湖延綿伸展，佔了地峽約三分之一的寬度，因此從這條大湖到印度洋的陸上距離只有約 40 公里。

[1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指定泉州是海上絲綢古路的終點。

[15] 這一出色的研究是思鑒（Janice Stargardt）博士對在塞丁普拉多年實地考古工作的總結。

至少從 7 世紀開始，塞丁普拉與泰國灣整個地區就有著貿易往來。自 10 世紀中期以來，留在此處的來自中國的陶瓷殘片越來越密集，從這個時期直到至少 14 世紀晚期，塞丁普拉在不斷壯大的跨地區貿易網中處於中心位置，這張貿易網連接了中國南部、東北亞、蘇門答臘，並通過跨越克拉地峽的貨物轉運與印度洋相連。

塞丁普拉有一個近代最早採取公共行動來提供公用商品的傑出例子。塞丁普拉王國開鑿了一個交通運河網絡，意味著貨物可以走水路穿過克拉地峽的大部分地區，這是批量運輸最便宜的方式，運河網絡建設的最終階段於 11 世紀完成。看來塞丁普拉的統治者優先修建橫跨克拉地峽的交通運河，甚至將灌溉和本地運輸所用的運河置於其次。從南海穿過克拉地峽將貨物運到印度洋的距離縮短了約 2000 公里。（Stargadt, 2001:338）

在東南亞的所有考古遺址中，塞丁普拉到目前為止擁有的中國瓷器碎片最多。儘管整片遺址能被發掘的只有一小部分，但發掘出的物品中僅是 1000—1400 年的中國陶瓷碎片就有約 5 萬塊。除了大量陶瓷，很可能還有大量絲綢和茶葉通過塞丁普拉進行貿易，不過埋在地下的絲綢和茶葉沒法保存 1000 年，陶瓷碎片則可以。這些陶瓷大部分品質上佳，價值重量比相對高，主要來自中國南方的少數幾個窯口。遺址發現的所有中國陶瓷碎片中有 45% 來自浙江龍泉窯，龍泉窯陶瓷是「當時最精美的陶瓷之一」（Stargadt, 2001:344）。剩下的大部分來自江西景德鎮和福建德化。這麼多從中國出口的優質陶瓷的存在，反映出中國商業出色的組織水平：「這些優質陶瓷反映了對於塞丁普拉作為中轉港口的特定要求，也體現出它所隸屬的貿易網絡。它們表明中國的

陶瓷業和國內貿易的組織能力已經很高，國內商人能夠採取適當的貨品裝船的方式來長期應對市場需求。」(Stargardt, 2001:356)維持這個出色體系的中國商業社區有可能在泉州和廣州。

其他考古資料可以補充在塞丁普拉的研究，包括在泉州發現的一艘宋朝末年從事南海貿易的船隻殘骸。^[16]由於船隻沉沒時的獨特狀況，船上所裝的南海熱帶焚香和其他貿易產品保存了下來。這艘船當時正從南海返回，帶著各種木質產品，包括 2400 公斤的焚香木材。修復這艘船得出的結論是它在東南亞海域逗留了一段較長的時期。到 12 世紀，東南亞已經出現了泉州商人的半定居區甚或完全定居區。(Stargardt, 2001:373)從塞丁普拉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有可能包括來自馬來半島不同地區的四大類林的木產品。(Stargardt, 2001:358)首先是由芳香木材、樹脂和樹脂晶石製成的焚香產品，包括兩塊上好乳香、兩塊上好樟腦和一塊中等質量的焚香，焚香在中國的銷量很大；其次是藥材；第三類是致命毒藥；第四類是造船用的木材密封膠、索具、繩索、填料和浮標。「高級焚香的交易價值巨大」，「南方異域貨物的總數龐大」，為了支付進口貨物的費用，中國需要大量出口優質陶瓷。(Stargardt, 2001:364-5)

在雅加達以北 150 公里處的印坦，人們發現並挖出了 10 世紀的中國沉船，為了解傳統南海貿易的範圍帶來更多啟示。(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看來這艘船正從廣州返回，船上裝著各式中國陶瓷，產地遍佈中國各地。「在中國境內為長途航行到南海的船隻組裝一船貨物

[16] 船隻殘骸在泉州海洋博物館展出，格林提供了相關信息。(Green, 1983)

涉及複雜的內部營銷和運輸流程，（地理分佈廣泛的不同產地）為配合這些流程提供了寶貴的見解。」（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船上的貨物還包括中東的玻璃器皿，更重要的是包括大量沉甸甸的銀錠，價值等於宋朝政府從整個中國取得的全部年度財政收入的 1.15%。（Twitchett 和 Stargardt, 2002:27）這艘沉船形象地說明：中國船隻橫渡南海在中國、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之間開展的長途貿易，具有整合度高和規模大的特徵。

近代早期

15 世紀，中國政府在 1405—1433 年組織大型船隊 7 次出使從婆羅洲到東非的地區，船隊全部由鄭和指揮。鄭和出生於雲南一個穆斯林家庭，其父曾到麥加朝聖。第一次下西洋包括 62 艘大型帆船，鄭和帶領一支約 3 萬人的隊伍。第一站是馬六甲，接下來的一站是蘇門答臘的巨港，這座城市「早被中國人所知」。鄭和抵達前 30 年的 1377 年，一位在廣東南海縣土生土長的中國海盜頭子梁道明控制了該城市，「這是印尼或馬來西亞有大批中國人的最早標誌之一」（Fitzgerald, 1972:95）。儘管巨港並不是明朝的殖民地，「但在將近 200 年中仍然處於中國的控制下」（Fitzgerald, 1972:96）。船隊隨後穿過印度洋抵達古里（今印度科澤科德），後返回中國。第二次下西洋是在 1407 年，船隊抵達暹羅、爪哇、錫蘭和古里。1409 年第三次下西洋船隊走了相似的路線。頭三次下西洋船隊造訪了南海周邊和印度洋中的地區，這些地區「早被中國航海員熟知」（Fitzgerald, 1972:97）。印度南部城市的繁榮

「部分是因為它們是來自西域的阿拉伯船隻和來自東方的中國船隻的會聚地」(Fitzgerald, 1972:97)。後四次下西洋行程遠得多，船隊到訪了霍爾木茲、波斯灣和馬爾代夫，行程覆蓋了包括摩加迪沙和莫桑比克在內的整個東非海岸。

船隊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加深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時「向南亞、西亞地區的國王和蘇丹展示中國作為亞洲政治和文化領先之國的力量與榮耀」，「誘導他們承認中國皇帝的名義宗主地位並向中國宮廷派遣進貢使團」(Needham, 1970:50)。這些由遠洋平底帆船組成的大型船隊規模比同期的歐洲船隊大得多，很多船重至少 1500 噸，而 1488 年巴托羅繆·迪亞斯環繞好望角時的船隻僅重 300 噸。儘管鄭和的船隊裝備有火槍等武器，而且船隻規模巨大，但並未企圖建立外國要塞或殖民地。整個行動是「海軍對外國港口的友好訪問」：「確實，幾乎無法用海軍這個詞來描述中國船隊，它們更像是商船隊的集合，而不是一個國有化的貿易管理機構。」(Needham, 1970:53)

一個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在鄭和下西洋後「變得內向」，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幅縮減。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沒有自己的英國式「工業革命」，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外貿在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後大幅縮減。不過，鄭和的船隊是政府官方的遠征，與中外商人跨南海運貨開展的長期貿易沒有直接關係。到 18 世紀中期，中國與東南亞和歐洲的海上外貿都大大增加，中國平底帆船的規模比歐洲的相應船隻更有利於運送貨物。中國最大的商用平底帆船載重量可能有 1000 噸，能承載 180 名海員：「成百上千的這些牢固商船每年定期從廈門或廣州往返馬六甲海峽，冬季在南方，夏季在北方。它們遵循詳細的航路指南，沿途經停

無數港口。所謂的『西』線沿著越南、暹羅和馬來半島的海岸前進……『東』線將船隻帶到馬尼拉、摩鹿加和爪哇。與東南亞的貿易在中國的船上持續進行……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手中。」(Fairbank, 1965:73)

此時江南大部分地區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包括長江三角洲。1815 年江南的人口約為 2600 萬 (Li Bozhong, 1986)，而中國的人口總額約為 3.3 億。相比之下，1820 年歐洲的人口約為 1.9 億，包括法國的 3200 萬、德國的 2500 萬和英國的 1400 萬 (Cipolla, ed., 1973:747)。

到 16 世紀晚期，紡織業成為江南產業經濟最大的一個部分；到 17 世紀末，江南是世界最大的織物和纖維出口地，商業化和城鎮化程度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 (Li Bozhong, 1986)。南京是絲綢業中心。19 世紀 40 年代，近 20 萬人從事絲綢業，織機超過 3.5 萬台 (Li Bozhong, 1986:21)。松江縣是中國交易類棉布生產最發達的地區。蘇州是中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到處都是布料商人，也是染料中心」(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171)。清朝時，江南生產的交易類棉布約有 90% 出口到中國其他地區或海外。18 世紀，出口中增長最快的是對歐洲的出口，在 18 世紀的最後 20 年，出口到西歐和美洲的「南京布」(在南京和江南其他地區織的布)飛速增加。(Li Bozhong, 1986:27) 18 世紀早期，約有 5 千艘遠洋船隻的基地在南京，噸位是 1700 年所有類型英國輪船的 2.8 倍。(Li Bozhong, 1986:53) 18 世紀晚期，據載僅上海和乍浦的港口就有約 5000 艘遠洋船隻，總重估計約為 55 萬噸。據載每家大商戶都擁有自己的船隊，每支船隊的船隻超過 100 艘，雇用超過兩千人。(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364)

15 世紀著名的鄭和下西洋表明中國的技術和文化比他到訪的地區

（包括東南亞）優越。不過，儘管中國與東南亞有著深厚的貿易關係，中國並未試圖殖民南海周邊的地區。中國幅員遼闊且擁有優越的技術，想要殖民其他地區完全可以，但中國的領導者選擇將重心放在治理自己的國家上。

隨著時間推移，華人社區在南海周邊地區發展起來。中國人去這些地區主要是為從事與貿易相關的活動。到 15 世紀鄭和下西洋時，「中國的海上貿易和中國人向東南亞港口的遷移流動已經呈現較大規模」（Fairbank, 1965:423）。早在歐洲船隻進入南海之前，「中國的平底貿易帆船是東亞國際商業的主要載體」（Fairbank, 1965:29）。與歐洲商人後來的活動不同，中國商人在南海周邊地區的活動「很少得到中國政府的海軍或政治行動的支援」（Fairbank, 1965:29）。海外華商社區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沒有帝國的商人」（Wang Gungwu, 1990）。

16 世紀，蘇門答臘的華商社區比葡萄牙的商業社區大得多。在蘇門答臘的主要胡椒港口占碑，中國人是商界的主要成員，與來自暹羅、爪哇和馬六甲，以及荷蘭、英格蘭和中國的船長打交道。（Curtin, 1984:170）爪哇西端的萬丹港有一個「重要的華人社區，這些華人是胡椒貿易的中間商」（Curtin, 1984:170）。有些華商參與當地的海上貿易，有些則提供經紀業務和其他商業金融服務。占碑的蘇丹在政府服務中使用華人經紀商、譯員和過秤員。（Curtin, 1984:170）

據記載，17 世紀有超過 1 萬中國人在暹羅居住，其中 3—4 千人住在首都大城。（Curtin, 1984:168）由於在曼谷本地容易得到柚木，曼谷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中國式平底帆船的中心。中國與暹羅的貿易在 17 世紀迅速增長，船主和船長主要是中國人。（Curtin, 1984:169）

18 世紀晚期的暹羅國王有一半中國血統，他是一位潮州（廣東東部汕頭）商人的兒子，收留了主要來自潮州的中國移民。1767 年曼谷成為暹羅的都城時，超過一半的人是中國人。（Fairbank 和 Reischauer, 1965:459）今天潮州有約 3000 萬人口，其中約一半住在南海周邊地區，主要在泰國。他們有自己的方言和金融網絡，外人很難滲透。

寧波至少自唐朝以來就與東南亞（和東北亞）有著深厚的商業關係，製造產品的原料有一大部分從南海和中國其他地區進口。用進口材料在寧波製造的產品包括船隻、傢具、木雕、漆器和紙張。（Shiba, 1977:430—1）寧波繁榮的中國境內地區間貿易大量依靠與傳統地方銀行（錢莊）合作的本地商人網絡。18—19 世紀，寧波人除了移居到中國其他地區外，在東南亞的僑民區也發展起來：「19 世紀海外的寧波商人以『宗族情結』和對原籍地忠心不貳著稱。」（Shiba, 1977:437）

東南亞的華人社區不受中國政府保護，不斷遭到襲擊。例如從 1565—1815 年，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地與在中美洲的殖民地之間的跨太平洋貿易興旺發達，中國商人用中國的平底帆船將中國貨物帶到馬尼拉，他們帶去中國絲綢、瓷器和名貴傢具，換回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魯礦山開採的銀塊。馬尼拉的華人社區大規模發展，除了商人和水手，還有從事各種職業的各類華人。到 1586 年，馬尼拉估計有 1 萬華人。1603 年，西班牙軍隊加上菲律賓本土人和日本軍隊屠殺了約 2 萬華人。^[17] 華人數量迅速再次增加，但 1639 年又發生了一次屠殺，估計

[17] 詳見 Borao, 1998。鮑曉鵬（Borao）的研究特別有用，因為它借用了中國政府自身開展的詳盡調查。這一調查在試圖了解暴力發生的原因時極為客觀，沒有為華人社區開脫責任。中國政府的調查為了解海外華人社區（不論貧富）與其所居住的東南亞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帶來了明亮的曙光。對東南亞華人社區的反覆襲擊，包括 20 世紀 60 年代在印尼的襲擊，使得仔細研究以找到根本原因成為必要。

有 2.3 萬華人遇害。1686 年和 1763 年再次發生華人屠殺。

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東南亞華人的數量在歐洲殖民統治下快速增長，包括一大批為了在橡膠園和礦井工作而移民的窮人。今天，南海周邊各國可能有多達 4000 萬—5000 萬華裔，每個國家都有一小部分華人成為商業結構的重要部分，^[18] 還有為數更多的華人從事各種普通職業。

中國與南海的長期關係^[19]

西方評論人員普遍認為，中國最近才開始主張在南海的權利，而且主要與南海海底可能儲存的大量油氣相關。不管怎麼看待中國主張的法律效力，也不管南海爭議可能怎麼解決，中國對其在南海享有權利的觀點自古就有，遠遠早於最近在海底發現能源的日期，與中國商人跨南海將貨物從中國南方港口運往東南亞港口的悠久歷史緊密相關。一個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對一個與國家本土相距甚遠的地區主張司法管轄權是異乎尋常的。事實上，國家在遠離本土的領土擁有司法管轄權一點都不反常，在很多例子中，這些領土與相關國家的距離比南海與中國本土的距離遠得多。

以前沒有現代地圖和導航輔助設備，人們運用傳統的航運技術在南海航行極為危險。南沙群島由多達 400 個島嶼、岩礁、暗礁、環礁、堤岸和淺灘組成，其中沒有一處可以永久居住。西沙群島由 20 多個島嶼、岩礁、暗礁、環礁和淺灘組成。國際法庭的觀點是「即使是不顯

[18] 對南海周邊經濟體中海外華人的重要程度有各種不同的估計。

[19] 這部分大量依賴申建明 (Shen Jianming, 2002) 的細緻研究。

著的主權展示」也能對「遙遠或幾乎無人居住的領土」確立主權。^[20]全世界沒有幾個領地的特點能比南海群島更適合叫作「遙遠」或「無人居住」。除了西沙群島的幾個島嶼，南海群島大部分是無法居住的。

中國船隻橫渡危險的南海海域的歷史已超過兩千年。中國在漢朝甚或更早時期已在製造大型遠洋船隻。西漢（公元前 206—公元 8）統治者與東南亞、斯里蘭卡和印度建立並維持了緊密的航海和商業關係。西漢使節採用穿過南沙群島的海上路線，而不是傳統的沿岸路線，這減少了幾個月的旅行時間，能做到這點是因為人們詳細了解了南海海中和海底的障礙物。後世要麼繼續利用以前開發的航道，要麼開發新航道來進一步縮短中國大陸與南海海中和海外目的地之間的航距。鄭和跨南海下西洋的航道早被中國海員所熟知並使用了幾個世紀。這些航線自宋代以來被歸納成兩大航線：東海線和西海線，每條海線又再分為一條主線和一條副線。

來自廣東、海南和其他沿海地區的中國漁民幾個世紀以來都將南海作為捕魚基地。漁民經常將南海群島當成遮蔽處或停靠點，有些甚至在島上種植農作物。1868 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海指南》中提到海南島漁民的足跡「可在群島的每個小島上找到，有些漁民甚至會在島上住較長時間」（Shen Jianming, 2002:130）。

至少從漢朝開始，中國就認為南海及其島嶼屬於自己管轄和控制之下。唐朝時西沙和南沙被歸於瓊州縣（今海南省）管轄。明清中央政府「始終認為自己對南中國海群島及其毗鄰地區擁有主權」（Shen

[20] 《對西撒哈拉地位的諮詢意見》（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Status of Western Sahara*, 1975）。

Jianming, 2002:130—3)。從北宋(960—1127)至清朝，廣東、海南及其下屬行政縣郡的各種官方記錄始終明確：中國有意也確實對南沙和西沙群島及其毗鄰海域行使了司法管轄權。

在越南北部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年代(公元前111—公元938)，中國海軍經常在南海巡邏。中國海軍在元、明、清朝繼續在南海巡邏。明朝關於瓊山縣(海南島)的官方記錄寫道：「廣東瀕大海，海外諸國皆內屬……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艘，巡邏海道幾萬里。」(轉引自 Shen Jianming, 2002:125)

早在宋朝，中國地圖就已將南海群島作為中國境內地區包括進來。元、明、清朝的官方地圖也始終將南海群島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包括在內。1932年、1935年和1947年，國民黨政府對南海開展了三次大規模勘察。1948年的地圖包括大部分南海島嶼的標準化名稱，並採用了著名的U型虛線來指明中國對南海的主權。1949年後，中國政府在官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中繼續沿用這種做法。(Shen Jianming, 2002:122—9)^[21]

1951年，中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說：「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跟東沙和中沙群島^[22]一樣，始終都是中國的領土。」(轉引自 Shen Jianming, 2002:145，譯者注：中文譯自英文)1958年，中國政府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聲明西沙和南沙群島跟東沙和中沙群島一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1992年中國通過《中華人民

[21] 即使在中國學者中對南海周圍「虛線」的確切含義也有爭議。有人認為這適用於中國對虛線以內整個地區的主權，也有人認為中國的主權只適用於島嶼和有島嶼特徵的地區。(Shen Jianming, 2002:129)

[22] 東沙群島位於中國香港東南340公里處。中沙群島位於東沙群島西南和西沙群島東部。

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地領土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決定」，重申中國在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提出的對各群島的主權和權利。

3. 西方殖民主義與絲綢之路

西歐殖民主義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關係在遠超過一千年的時間裡基本和平，來自中國、阿拉伯國家、印度和東南亞的船隻大多都不攜帶槍炮。這些船隻從東非到中國南方所停靠的港口都很國際化，多種文化在這裡並存。在印度洋和南海的各個港口，伊斯蘭教、佛教、儒教、拜火教、基督教基本上和諧共存。在商人開展貿易的那些地方，政府大都盡力發展貿易，認為貿易對於社會有利。由鄭和率領的中國探險船隊，就是這種和平關係的最佳體現。鄭和船隊最後一次下西洋是 1433 年。

葡萄牙人進入印度洋的時候，歐洲生產的商品很少能讓亞洲人產生購買慾望。達伽馬（Vasco da Gama）1498 年第一次去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明代古籍稱「古里」）時，拿出了他們帶去的條紋布、兜帽斗篷、帽子、珊瑚串、洗手盆、糖、油和蜂蜜等商品。國王看了後嘲笑葡萄牙人，建議他們不如拿黃金交換。據估計，1750 年時，西方（指歐洲）的產值僅佔全球製造業產值的 18%；相比之下，南亞佔 24%，中國佔 33%。直到 18 世紀末，中國的技術幾乎在每個方面都領先於歐

洲或者至少與歐洲相當。但有一個方面歐洲的技術毫無疑問優於亞洲，那就是軍事。15 世紀和 16 世紀，歐洲經歷了陸地和海上的軍事技術革命。引發軍事技術革命的是新興歐洲國家之間的暴力衝突與對立，這些國家在現代初期開始成形，在 17—18 世紀的「絕對主義時代」羽翼漸豐，在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時代繼續發展壯大。^[23]

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航海之後沒過幾年，葡萄牙人就繞過了好望角。歐洲的區區小國葡萄牙，是歐洲暴力入侵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排頭兵：「不可否認，與印度洋上那些沒有武器的穆斯林船隻相比，葡萄牙艦船的武器相對更加精良；歐洲侵略者又有著其亞洲對手所不具備的頑強意圖，這更強化了葡萄牙的優勢。」(C. H. Boxer，轉引自 Chaudhuri, 1985:77—8) 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洋，「使該區域的和平航海系統戛然而止，而在過去，和平航海系統的存在是印度洋區域極其突出的特徵」(Chaudhuri, 1985:63)。鄭和率領的船隊與葡萄牙船隊「確實是天壤之別」：「中國的整個做法是海軍友好訪問外國港口，然而對比之下，葡萄牙在東蘇伊士幾乎是立即發動了全面戰爭。」(Needham, 1970:53) 只要葡萄牙人是沿非洲西海岸下行，他們的活動相對是比較受限的，當然除了奴隸：「1500 年之後，歐洲的海軍已經有實力先後向東非阿拉伯國家、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發動恐怖主義戰爭；此時，歐洲海軍才顯示出他們的力量能促使他們做到何種程度。」(Needham,

[23] 基根(Keegan)以圖像展示了互相激烈競爭的歐洲國家如何「實現」軍事技術的長期革命，他在書中比較了阿金庫爾戰役(1415)、滑鐵盧戰役(1815)和索姆河戰役(1916)中技術導致軍事殺傷力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Keegan, 1976)

1970:53) 葡萄牙「大力傳揚十字軍心態，並將其運用到海軍征服整個南亞的活動當中」(Needham, 1970:53)。在 16 世紀，葡萄牙沿印度洋和東南亞海岸向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發動了戰爭。到 16 世紀末，葡萄牙已經沿海上絲綢之路建立起了一系列勢力範圍和堡壘，其中包括莫桑比克、霍爾木茲、果阿、科倫坡、馬六甲和澳門。葡萄牙的海外擴張得到了當時國王的大力支持，這位國王自詡為「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及印度之征服、航海與商業之王」(Fairbank, 1965:18)。葡萄牙君主希望通過擴張，不僅達到讓那些不信奉天主教的人皈依天主教這一宗教目的，還在經濟上獲益。

此後，葡萄牙遭到荷蘭、法國和英國這些更加強大的歐洲對手的挑戰，並且被打敗。17 世紀，這些國家都建立了由國家支持的武裝「東印度」貿易公司，引領它們在亞洲的擴張。接下來，這些國家之間又對亞洲和西方之間海上貿易的控制權展開激烈爭奪，它們在海外的暴力衝突在歐洲內部也同樣上演。到了 18 世紀末，英國確立了其對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1858 年，東印度公司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西敏（指英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英國對印度的控制權正式確立。在 19 世紀最後幾十年，繼歐洲大陸和北美工業化之後，西方國家之間爆發了新一輪的對立衝突。這對南海海域的土地產生了巨大影響。到 1900 年前後，英國在包括新加坡和沙撈越在內的馬來半島確立了殖民統治，法國、荷蘭和美國則分別在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群島和菲律賓建立了殖民統治。也是到 1900 年時，按照「不平等條約」，那些在南海貿易中處於核心地位的中國南方主要港口城市都被迫對西方開放，讓西方人居住和經商。這些城市包括廣州、廈門、福州、寧波、汕頭和上海，

還包括香港，香港在南海關係中處於至關重要的位置，直到 1997 年都是英國殖民地。

1890 年，軍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所著的影響深遠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出版。他提出，海權對於增進國家實力和繁榮必不可少。他認為英國的海外力量不僅取決於它與歐洲大陸不接壤的有利地理位置，還取決於它在國外刻意獲得的關鍵戰略基地。這使得英國能夠在世界最脆弱的節點控制世界航運。直布羅陀、馬耳他、蘇伊士、亞丁、新加坡和好望角都證明了這一點。馬漢的最終目的是說服他的美國同胞，如果吸取了這些經驗教訓並採取相應行動的話，美國有可能成為一個海軍強國，或許會是海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通過控制大片公海，有壓倒一切的海上控制權，就能封鎖商船進出敵人海岸的要道，這只有最強大的海軍才能做到。」（Mahan, 1890:xxxii）1916 年前，所有主要國家競相建立強大的艦隊，正是出於這種信念。馬漢的觀點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羅斯福擔任總統期間（1901—1909），美國大幅擴建了海軍。1907—1909 年，由 16 艘巨大的戰艦和輔助艦組成的「白色大艦隊」環球巡航 14 個月，在墨西哥、巴西、菲律賓、錫蘭、埃及和地中海宣示美國海軍的崛起。

西方列強不僅在南海各島殖民，還在太平洋更廣闊地區建立了殖民地。此時北美洲主要被白人佔領，這些人經過長時間的暴力征戰（其中包括對印第安土著的大屠殺）打遍這塊大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通過幾乎滅絕土著人口，確立了白人的殖民統治。太平洋大部分重要島嶼屬地都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管轄之下。

美國還吞併了夏威夷群島，從俄羅斯手裡買下了巨大的阿拉斯加屬地（其中包括綿延北太平洋 1000 公里的阿留申群島）。到了 1900 年，日本奪得了對獨立小國琉球的控制權，琉球此前數百年都是中國的附屬國，這時被迫併入日本，成了日本的「沖繩縣」。

俄羅斯殖民主義

俄羅斯帝國的擴張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亞。16 世紀，莫斯科大公國吞併了喀山（1552）和阿斯特拉罕（1556）。俄羅斯版圖橫跨西伯利亞，1649 年擴大到太平洋，1783 年吞併克里米亞。1730—1848 年，俄羅斯吞併了哈薩克北部。1864 年，俄羅斯開始征服中亞核心地帶的最後堡壘，先後征服了塔什干（1865）、布哈拉（1868）、希瓦（1873）、浩罕汗國（1876）和梅爾夫（1884）。這一整片區域都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俄羅斯在中亞擴張之時，正值 19 世紀清朝災難性地衰落，其中包括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崩潰。在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時期，從歐洲直至太平洋的大片廣闊土地自蒙古帝國以來第一次在政治上統一。

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中亞興起了聲勢浩大的建立「突厥斯坦自治國」運動，自治國主張有自己的軍隊、外交政策和財政，並且統一中亞各民族。1920—1924 年，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拒絕了這一提議，開始了漫長的在蘇聯內確立單獨「共和國」的劃分過程。（Soucek，2000：第 16 章）蘇聯的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找出了單獨的文化和語言群體，形成了每個中亞「共和國」劃定邊界及強化各自「國家身份」的基礎。這為後來中亞解體為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

和土庫曼這些獨立國家奠定了基礎。^[24]

19 世紀中葉，俄羅斯向南推進，從西伯利亞進入大清帝國的疆域阿穆爾州。根據《中俄北京條約》（1860），俄羅斯佔領了阿穆爾河以北地區以及烏蘇里江與太平洋之間的沿海省份，這些省構成了東北的東海岸。該地區的主要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意思是「統治東方」。1891—1916 年，俄羅斯帝國建造了穿越廣袤草原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並且在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之間修建了鐵路。西伯利亞大鐵路建成時，東部終點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蘇聯時期，中亞的鐵路線更加密集，使該地區緊密地融入了蘇聯經濟。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專屬經濟區

1992 年，聯合國通過了一部「革命性」的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約》允許各國在距自己海岸線 200 海里（約 370 公里）的海域建立起專屬經濟區，有權通過海岸警衛隊艦隊進行巡邏和保護。根據這部《公約》，西方的前殖民列強都可以保留對各自遙遠屬地的管轄權，這些屬地往往人煙稀少或無人居住。英國的海外領地包括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南喬治亞島和南桑威奇群島、聖赫勒拿島、阿森松島和特里斯坦—達庫尼亞，這些都在大西洋；還有英屬印度洋領地和皮特凱恩群島，以及包括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24] 蘇聯領導人阻止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方式，與英法在「一戰」末時阻止在中東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的方式頗為相似。法、英、俄簽訂的臭名昭著的《賽克斯—皮科協定》規定了這一安排，俄羅斯革命後，托洛茨基披露了這個協定。

Islands) 和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在內的加勒比海各屬地。法國的海外領地包括克羅澤群島 (Crozet Island)、凱爾蓋朗群島 (Kerguelen)、聖保羅和阿姆斯特丹島、留尼旺和特羅姆林島等，這些都在印度洋；另有法屬波利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瓦利斯和富圖納、克利珀頓島 (Clipperton Island)，這些都在太平洋；還包括法屬圭亞那、瓜德羅普和馬提尼克島在內的加勒比海和中美洲領地。美國的領地包括夏威夷、關島、美屬薩摩亞、北馬里亞納群島 (North Mariana Islands)、鳥糞群島 (Guano Islands) 和威克島 (Wake Island)，全部都在太平洋。中國無爭議的專屬經濟區只有 90 萬平方公里，如果在南海的一切爭議都取勝的話，中國總共的專屬經濟區還不到 300 萬平方公里。法國的海外專屬經濟區面積達 1070 萬平方公里，美國 (包括阿拉斯加在內) 是 980 萬平方公里，俄羅斯是 670 萬平方公里 (即其太平洋和西伯利亞屬地)，英國是 600 萬平方公里，澳大利亞為 260 萬平方公里，新西蘭是 330 萬平方公里。(Nolan, 2013) 僅在太平洋，前殖民列強的海外專屬經濟區總面積就有 3090 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無爭議的專屬經濟區大 30 多倍；即使中國在與鄰國圍繞南海的一切爭端中獲勝，前殖民列強的海外專屬經濟區總面積也要比中國專屬經濟區的最大可能面積大 10 倍。

4. 中國、絲綢之路與世界

絲綢之路與朝貢制度

朝貢制度自古就存在，甚至在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7）統一中國之前就已出現，^[25] 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晚期。琉球（沖繩）最後一次派出朝貢使團是 1875 年，^[26] 安南最後一次派出朝貢使團是 1883 年，朝鮮是 1894 年，尼泊爾是 1908 年（Fairbank 和 Teng, 1941:197）。按照朝貢制度，蠻夷民族派代表正式向中國朝廷呈交禮品，認可他們的國家可能從中華文明獲得的益處。這種朝貢體系與中國的對外貿易緊密交織在一起。朝貢使團在往返中國首都的路程中受到皇帝的保護，並被允許在京城專門市場進行貿易；這些市場由政府官員監督，以確保「公正公平的貿易」：「如果有任何人賒賬購買並故意拖延（付款）、舞弊或試圖『夾塞』，導致外國人長時間等待，那麼此人連同那些與其私下交易的人們將受到處罰，還將在他們的店鋪前戴枷示眾一個月。」（Fairbank

[25] 「在殷商湯王時期（公元前 1766—前 1754），氐羌人（在甘肅東部和青海地區的古老的藏部落）就對湯王進行朝貢。在太戊王時期（公元前 1637—前 1563），遠方來朝貢的部落包括了 76 個國家。」（Fairbank 和 Teng, 1941:142）

[26] 事實上，琉球在 1877 年組成了一個使團，準備坐船到中國進行朝貢，但是這一計劃卻被日本阻止了。

和 Teng, 1941:167)

天子(皇帝)與附庸國之間的關係是以道德為基礎的，因此是互惠互利的：「附庸國順從、虔誠，皇帝寬厚仁愛、居高臨下。這些相互關係需要正式的表達。呈禮是一種儀式，平衡兼顧帝國款待和回賜禮物的形式。」(Fairbank 和 Teng, 1941:147)所有希望與中國建立起關係的國家和地區都需要作為「中國的附庸國」進行這樣的朝貢，「承認中國皇帝至高無上，聽從皇帝的命令，從而排除了平等交往的全部可能性」：

朝貢制度絕對不能解釋成征服或全面主宰的理念，因為它對那些選擇不進入中國人天下的外國人不強加任何條件。朝貢尋求的是和平和安全，而這兩者與國際關係的常態是不相容的。如果一定要有關係，那麼必須是宗主和附庸的關係，接受這種關係，對中國人意味著按中國道德認可蠻夷民族……絕不能以為中國朝廷從朝貢中獲利。帝國回賜的禮物通常比貢品價值更高……19 世紀後半葉以前，中國朝廷官員對於應該或可能通過國際貿易的方式增進國家財政和財富的說法嗤之以鼻。從中國的角度而言，允許貿易的用意是顯示帝國的恩惠並且使蠻夷民族保持順從的適當狀態。(T. F. Tsiang, 轉引自 Fairbank 和 Teng, 1941: 140)

來到中國朝貢的國家和地區曾經一度包括了中亞、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大部分成員，以及更遠的國家和地區。明朝的一份 1587 年的朝貢國詳細清單上列出了「由西域 38 個國家進獻給朝廷的貢品」，全都「途經哈密」(Fairbank 和 Teng, 1941:153)。進貢的國家和地區包

括：喀什、赫拉特、布哈拉、克什米爾、大不里士、撒馬爾罕、吐魯番、伊斯法罕、霍拉桑，以及安那托利亞和麥加。（Fairbank 和 Teng, 1941:154）來自南海周圍以及更遠地方的國家沿著海上絲綢之路，早在漢代就已經開始派遣朝貢使團謁見中國的統治者。（Wang Gungwu, 1998:117–121）在 1587 年編製的一張明細清單中列出的朝貢者來自安南、暹羅、占城、緬甸、爪哇、文萊、婆羅洲、菲律賓、馬六甲、卡利卡特、孟加拉、錫蘭、敘利亞、霍爾木茲和馬爾代夫。（Fairbank 和 Teng, 1941:151–2）

貿易和文化

中國與亞洲 朝貢體系與貿易密切相關。但是，中國國際貿易的主體部分在朝貢體系之外。除了中國商人的海外貿易外，還有無數的外國商人在中國城市開展貿易，這些城市包括中國沿海港口，如廣州、泉州和寧波，以及在北方和西部的內陸貿易中心，如西安和蘭州。

中國的技術及相關文化對絲綢之路沿線的地方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瓷器的製作、絲綢生產、絲綢紡織和造紙技術傳播到了中亞。中國的文化，包括書面文字和儒家官僚體系，對日本、韓國、琉球和越南北部影響很深。越南從中國獨立出來後，於 1070 年在河內建造了文廟，直到 1779 年都起著越南官員的「大學」的作用。廟中的許多院落都有一長排石龜，每隻石龜上都有一塊石碑，上面用中文記載著考試上榜的候選人名字，這是基於與中國相同的儒家原則。幾個世紀以來，朝鮮和日本的書面文字都是中文。儒家思想深入滲透到朝鮮、日本和

越南。日本佛教中「禪」(Zen)的起源就是中國的「禪宗」。(Zurcher, 1964)

中國對東南亞文化的影響比對東北亞近鄰的影響小一些。印度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文化傳播到東南亞主要是通過貿易。菲律賓從 16—19 世紀末都受西班牙的統治，由於天主教的廣泛影響力，中國的文化影響受到了限制。伊斯蘭教、印度教、天主教在東南亞大部分地區都是比中國儒家思想更強大的文化力量。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大量華裔少數民族人口仍然是「旅居者」，與原籍的聯繫越來越疏遠，但是仍然在相對封閉的社區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Wang Gungwu, 2000)一小部分東南亞華人經商極其成功，其中有幾個人建立起了遍佈整個區域的商業帝國。歷史上一再出現過針對整個華人的襲擊，部分原因是在他人看來部分華人在商業上取得了主宰地位。

除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外，絲綢之路沿線的國際貿易也促進了文化傳入中國的強大機制的形成。佛教和伊斯蘭教沿著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播。

中國與西方 秦朝統一中國後兩千年來，中國大部分時期是和平的，並且形成了龐大的自由貿易區，在那裡，商業和「資本主義萌芽」隨著時間的推移蓬勃發展和擴大。(Xu Dixin 和 Wu Chengming, 2000)在市場失靈的方面，國家行使了至關重要的職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在這種結構下，中國的國民總收入、大眾生活標準、城市的繁榮、啟蒙文化和技術創新水平，都遠遠領先於歐洲。(Needham, 1964)

在眾多技術領域，中國成熟的市場經濟刺激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

創新，這遠遠早於西方：「在文藝復興時期及之前，中國在技術方面的影響力佔有相當強的主導地位。」(Needham, 1964:237) 中國早於西方的創新包括：絲織、造紙、印刷、火藥、瓷器、煉鋼、獨輪車、指南針、船艙柱舵輪、弓形板拱橋、船舶防水密封艙、曲柄和雙作用活塞風箱，而後兩項技術綜合在一起幾乎構成了「完整的蒸汽機雛形」(Needham, 1970:121 和 136)；還有馬鐙和高效馬具。這些技術及其他技術主要是通過中國和外國商人，沿著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歐洲的。

利瑪竇 (Mathew Ricci) 的中國札記 (1583—1610) 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有助於培育這樣一種啟蒙觀念：通過合理的官僚結構統治而形成仁慈的專制是有可能的。「整個王國由滿腹經綸者號令施政，這些人常被稱為士。整個江山的有序管理完全依仗他們的責任心和職權。」(Mathew Ricci, 轉引自 Dawson, 1964:10) 1793 年，喬治·斯湯頓爵士描述馬戛爾尼使團的中國之行時說：「在自然和人工生產方面，其政府的政策和統一性、語言、舉止和人民的意見、道德準則和民間機構，以及總體經濟和國家的安寧，這一切都是可供人深思或研究的最了不起的對象。」(轉引自 Dawson, 1964:7) 直到 18 世紀後期英國工業革命，歐洲才趕上了中國，並且在之後的半個世紀內超過了中國。到了 19 世紀中葉的時候，歐洲人習慣性地把中國視為「永遠停滯」的地方。(Dawson, 1964)

結 論

中國政府「海上和陸上新絲綢之路」政策的核心是發展基礎設施和商業關係。為扶持商業、促進社會穩定而建設基礎設施，是中國自身兩千多年長期繁榮歷程的基石。中國這一新政策論述，是在古代貿易網絡以及中國與中亞和東南亞之間文化傳播的歷史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遙遠西方的歐洲是這些網絡的終點。19 世紀之前，中國和歐洲之間的相互作用大部分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中間貿易系統。參與這些貿易系統的不僅有中國人，還有居住在中國和遠西之間的區域的許多人。儘管與龐大的中國人口相比，他們人數很少；但是在中國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區，有包括佛教徒、阿拉伯人、穆斯林、波斯人和印度人在內的中亞和東南亞的關鍵貿易人群定居。也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南海周邊的地方定居。

中國過去的國際貿易與數量龐大的內部貿易比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從中國與西面和南面周邊地區深層聯繫的角度來講卻意義重大。中國與這些地區主要通過貿易關係，文化上長期深入共存、雙向交流，促使它們在這幅千絲萬縷的文化織錦中融會交織。

從羅馬帝國崩潰到 18 世紀，中國的商業化、城市化、技術和文化的水平都遠遠領先於歐洲，只是到了 16 世紀後差距才顯著縮小。中國

與中亞、東南亞的貿易和文化關係，引發了從中國到歐洲的長期技術流動；這有助於催生 16—17 世紀的軍事和海軍技術革命，西方靠這些技術革命征服海外。這種關係還對工業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通過工業革命，歐洲在 1800 年後僅僅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超越了中國。通過這種雙重革命，西方迅速崛起，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其中包括中亞和東南亞。然而，歐洲工業革命至今不到 200 年，西方對與中國之間各地區的巨大影響力，好比漆器上的薄薄的一層飾面。在其之下，是中國與這些地區之間複雜深厚的重重關係的「漆層」。這種互動關係歷史久遠，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